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

■ 侯惠勤

【提要】执政党要分清两种利益诉求：当权者的利益诉求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利益诉求，是执政党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新时期，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

【关键词】人民群众 利益诉求 理论创新 动力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08)10-0013-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关键在党、根本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忠实地代表和表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则不仅是党的力量所在，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在论及这一双向关系时，邓小平特别援引了列宁的一段论述加以表述：“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1]既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又善于影响群众情绪，不仅是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方式，而且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动力。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基本制度，遇到了日益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层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复杂性来自其是两类矛盾的交叉、两种趋势交织：一是一部分当权者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使其原有的理想信念日益淡薄，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心怀不满，大卫·科兹称之为“物质利益纽带的断裂”。^[2]另一是广大群

众虽然还愿意保持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但是对于物质利益诉求日益强烈，不断改善生活和调动积极性的内在关联日益明显。很显然，前者的利益诉求是非法的，因为其违背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后者的利益诉求是正当的，因为其体现了生产力和社会前进的要求；前者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是执政党如何防止自身的腐败、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如何在制度和体制建设上把物质利益和共产党的宗旨紧密联系的问题，后者则是其执政职能的发挥问题，是其如何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正因为这一挑战交织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是对于党的执政性质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执政的共产党如果满足了第一种利益诉求，就意味着蜕化变质，意味着被资本主义“西化”、“分化”；^[3]而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满足第二种利益的诉求，同样意味着“不够格”、“不合格”，意味着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的丧失。问题还在于，决不满足第一种利益诉求和必须想方设法满足第二种利益诉求结合起来才是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否则人民还是不满意。

毛泽东的教训就在于片面关注了不让第一种利益诉求得逞，而严重忽视了第二种利益的诉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第一种利益诉求的同盟军，即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4]实际上，尽管

反腐和改善民生都是人民的利益表达，但执政党在处理两种利益诉求的问题上，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利益诉求，并在这一过程中才能有效地防止党的蜕变，也就是说，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才能有效地改造主观世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牢牢地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注重利益的公平分配，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正如邓小平在谈及改革开放时所反复指出的：“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5]“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6]

只有这样一种认识上，才能正确把握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比如说关于“不争论”。邓小平就此有很准确的表述，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7]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在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进行生产经营以及具体的改革举措上（注意，不涉及改革的领导力量及根本方向问题），不搞“一刀切”，不搞强迫命令，靠事实说话，靠实际成效开路。这个实际成效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其着

眼点恰恰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利益，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打下基础。

可以作为邓小平这一思想的印证，是他在平息“八九风波”后，对新的中央领导层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8]“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9]只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领导人民的资格。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才是可能的。可见，不争论本身就是有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共产党必须领导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的改善民生的利益诉求。可以说，这是最大的政治。

二

利益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党内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诉求不合理，然而建立一个既能为人民所接受、又能稳定权力阶层队伍、同时与共产党人的理想宗旨可能协调的分配制度和利益机制，是和平环境下长期执政的党所必须面对的挑战。社会主义必须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使得原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观面临新挑战：原先预计可以很快“消亡”的国家将长期存在，因而面临着正规化建设的新课题；原先预计可以通过“平等化”方式消除官僚阶层和官僚主义（如同马克思所称赞的“巴黎公社”措施），却因为专业化、职业化的需求而必须保留相应的等级和收入差别；原先预计是最有觉悟的群体（代表人民的执政群体），却成为最容易接受资本主义腐蚀的对象；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在长期和平执政的条件下，理论上原先不存在的共产党自身利益问题开始凸显，并成



为不可回避的挑战。

我们并不都赞同大卫·科茨的下述观点，但它无疑值得思考。他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会有或长或短的经济危机甚至大萧条时期，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从来没有怀疑过资本主义这个制度，每逢危机来临，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投入到拯救社会的危机中。这是因为，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层，是财富多者的代言人，他们的联系是以物质利益纽带为基础的。如果社会崩溃，他们的个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可以说，拯救社会就等于拯救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前苏联的领导层，多是以所谓的“精神利益纽带”为联系。宣称信仰所谓的“共产主义”而结成的团体。但是，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精神则是虚无的。任何人也逃不脱物质。一旦物质利益受损，以精神利益为纽带的关系就会受到伤害，而产生动摇或者分解。“苏共的领导层里某些人，显然不想在社会主义这一棵树上吊死。”^[10]我们既不认为“精神万能”，也不认同“精神虚无”；同样，我们既不忽视物质利益，也不认同“钱能通神”。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战争时期没有或不明显的革命者自身的利益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必须以制度方式加以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本实践，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价值导向和利益导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统筹协调、完善配套，对合法个人（包括党员领导干部）利益的保护和对各类腐败丑恶现象的坚决打击并重等等。总之，应对物质利益上各种新问题、新矛盾的挑战，并不断地加以解决，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把握群众情绪、表达人民意志的基本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现实动力。

三

我们在坚定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所谓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11]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否定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的意义，实际上

把资本主义以至某国资本主义（例如美国）的道路视为人类的共同道路，通过“发展”和现代化维持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决不认为社会进步是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自然结果，相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从政治上思考和观察问题的结果，没有一个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政党，就不可能面对并解决“后发展”国家的众多社会矛盾，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科技进步也就难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更是无从谈起。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所提出的包括改革开放、“三步走”发展战略等，都是从政治上思考的结果。“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谈。”^[12]

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改革开放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13]

显然，我们所讲的改革开放，不是所谓的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为社会主义注入生机活力的人类文明新拓展；推动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也不是抽象的精神自由，而是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因此，以解放思想推动的改革开放

必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改革创新的结果是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当“孙子”，那当然不叫改革创新，而只能叫自我毁灭；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尽管它必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其成果却必然不与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不是任何现成模式的翻版。仅此而言，停顿、倒退本质上是因循守旧，谈不上任何创新性，就注定它是没有出路的；而“全盘西化”即使行得通，那也不叫改革创新，而是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也没有以“改革开放”自居的资格；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呼应、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辟倒退。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同进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追求，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

概括起来说，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对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对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这四个“科学”（即科学继承、科学把握、科学总结和科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四大根据（即理论基础、时代背景、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实基础和光明前景，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0页。

[2]以研究苏联解体原因而著称的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的调查表明，在1990年，已经有将近10万前苏的中上层领导开始背弃共产主义。这些苏共的领导层在面临经济困境的情况下，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上，认为这个制度存在先天缺陷，要求彻底改变制度以拯救国家。大卫·科茨将此现象归结为“物质利益纽带”的断裂。参见大卫·科茨：《苏联解体的

原因》，载于《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第31页。

[3]美国中情局档案里披露：在里根上台后，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共产主义者”弱点的学会。有社会学者，心理医生等等。这些学者普遍认为，在共产主义者诞生初期，基于其脱胎于赤贫者的本质，为了生存而必须要战斗，所以生命力比较旺盛。这也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败的原因。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慢慢增加，生活的逐渐安定，共产主义者的斗志会逐渐消磨。更重要的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使人與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纽带弱化。精神利益纽带就会变得相当不牢固。从领导者到被领导者，他们的物质关系相当简单，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提取等份的生活必须财富，他们不需要为别人和社会承担责任和风险，于是，一旦生活里出现不足，他们要埋怨的，只能是这个供养他们的社会体制。到了1990年，苏共内部充斥着一种不满情绪。不少党内领导公开声称自己的房子还不如一个美国牙医住的宽敞，并认为这种情况是体制造成的。

[4]最为典型的是，毛泽东把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在1962年为调动农民积极性“想找到一种将集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形式”的努力，视为“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刮“单干风”而给予严厉批判。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40页。

[5][6][7][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第59页；第374页；第312页；第371页；第77页。

[10]参见[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孟鸣歧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七章“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其奠基者是[美]W.W.罗斯托及其所著《经济增长的阶段》。“二战”以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美国模式”及其价值观念的手段，它提出，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只有充分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会带来社会和积极的积极变化、社会的更加富裕、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化的实现”。参见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2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冯 静